

译介之旅

“我实现了我的愿望”

——访2013傅雷翻译出版奖得主刘方 □本报记者 王杨

2013年12月12日，傅雷翻译出版奖在京揭晓。老翻译家刘方翻译的《布罗岱克的报告》最终赢得该奖。在获奖致辞中，刘方说：“我从小就喜欢法国文学，把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是我最大的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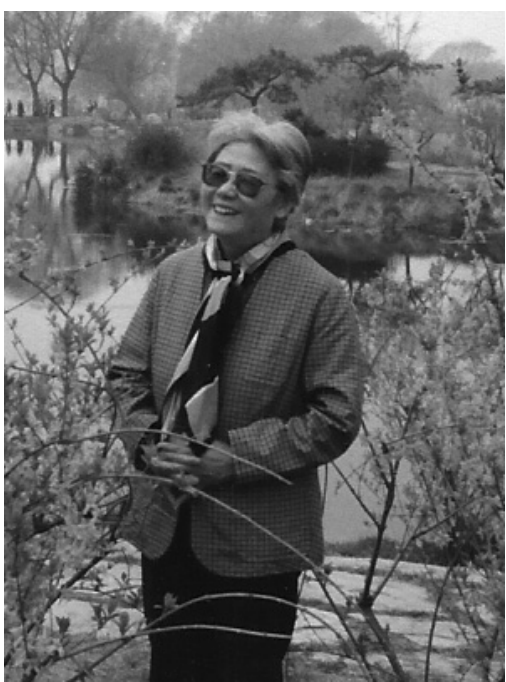
从事文学翻译是出于“兴趣主义”

刘方出生于1932年，18岁参军，成为第一批解放西藏的女兵，5年后转业先学俄语，后来进入南京大学外语系学习法语。刘方从小就喜欢文学，读着翻译小说长大，她至今还记得自己小学时读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特别喜欢翻译成中文的押韵诗句。

由于对文学的痴迷，外语系出身的刘方一门心思搞文学翻译。在南大学习5年法语后，刘方留校任教，后又调入中央电视台国际组，从事新闻翻译工作。“文革”后，刘方放弃了在电视台的工作，调入中国外文局主办的《中国文学》杂志社，从事中译外的翻译工作。当时很多人觉得她的工作“太奇怪了”，可刘方说自己就是“兴趣主义”，“我不喜欢新闻，我喜欢文学，我就是想做文学翻译”。当时的选择，刘方一直坚持到如今。

有了兴趣的指引，刘方想尽办法抓紧时间，刻苦钻研翻译。中译外可以说是刘方的“主业”，在《中国文学》杂志工作期间，她翻译了很多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和古今诗歌，退休后还将《少年天子》《穆斯林的葬礼》《老子》等中文作品译成法文出版。

20世纪80年代初，刘方开始“业余”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陆续翻译出版了罗伯尔·默尔勒的《倾国倾城》、雨果的《冰岛恶魔》、福楼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布瓦瓦与佩库谢》、巴尔扎克的《夫妻生活的烦恼》及散文，以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都德小说选》和加缪、艾利沙·特里奥莱、杜拉斯等人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译林出版社组织多位法语译者合译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7卷本，刘方与陆秉慧一起合译了第6卷《女逃亡者》。1996年，刘方参与、多人合译的《蒙田随笔全集》由译林社出版，她称翻译蒙田“难度大于翻译普鲁斯特”。因为蒙田随笔距今时代久远，他的创作风格晦涩难懂，在当时就曾受到批评，要准确地译出语句所传达的含义，的确有不小的难度。刘方介绍说，就像中国研究《红楼梦》有“红学”一样，法国也有“蒙学”，蒙田研究一直在不断发现新的材料或研究成果。当出版社要出新版《蒙田随笔》，询问译者是否要重新修订原译文时，译者们异口同声：“当然整改！”“重新一看，发现有很多变动，有的是我们自己的错误要改正，有的是有新的研究成果要补充”。刘方说：“发现错误很懊恼，觉得‘怎么会错呢’？所以新版的《蒙田随笔》基本上是重新翻译了一遍。”



刘方

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和兴趣，而在翻译作品的选择上，刘方也遵循“兴趣主义”，“有所译有所不译”。她对不同作者有自己的看法，在翻译中也有所选择。她喜欢阿尔封斯·都德，在翻译《都德小说选》的时候，自己选择翻译长篇小说《小弗乐蒙和大里勒斯》以及选本中的其他大部分作品。这部长篇描写了19世纪下半叶的巴黎社会，刘方特别对其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赞赏有加。她回忆与好友陆秉慧合译《巴尔扎克全集》杂文卷的过程时说，以前只知道巴尔扎克的小说写得好，翻译时才发现原来巴尔扎克的行文语言精练，风格犀利，翻译巴尔扎克杂文的过程也是再学习的过程，这样的翻译过程令她感到愉悦。而在翻译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成天树上的日子》之后，尽管出版社说杜拉斯的书很受读者欢迎，刘方还是回绝了再次翻译的邀请，她认为杜拉斯的作品“写出了异域风情”，但从文学角度看，并不是上乘之作，她不喜欢杜拉斯的文字。

“这是我翻译的最后一本书”

法国作家菲利普·克洛代尔的小说《布罗岱克的报告》曾获得2007年的“中学生龚古尔奖”，这一奖项的获奖作品往往比“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更受法国读者欢迎。刘方翻译该书，也是出于“兴趣主义”，“译过那么多书，能让我流泪的只有这一本”。刘方这样描述读书带给她的震撼：“下笔不多，但一个个鲜活的人跃然纸上，一

幕幕动人魂魄的场景让人终生难忘……没有正面描写战争，但上世纪那场侵略战争如何践踏人的尊严，如何扭曲人的灵魂，如何蹂躏天赐的美好，如何揭露尘封的丑恶，这里都有用血和泪提供的佐证。难怪作者的犹豫和惆怅始终溢于言表，而且感染了我。”刘方觉得，现在写这样的作品不多了，除了内容，该书在结构上看似天马行空，但脉络清楚，文字感染力强，不故作深沉，因此初读作品后她欣然决定翻译。

这是一份“连作者自己都认为很难翻译的‘报告’”，尽管是“老将”，但在翻译过程中，刘方还是碰到了一些技术问题，书中有德文词汇需要查德文字典；还有一些词句，需要与作者直接联系以求得更好的解释。作者建议刘方，文中的方言都原文照登，刘方答应了，但仅保留了作者认为没有意义的几个词的原文，而对于其他有意义的方言词句，尤其是特别重要的词句，刘方做了意译，她认为这样“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

对于《布罗岱克的报告》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刘方并没有思想准备，她甚至都不知道有傅雷翻译奖，主办方通知她入围了，请她参加颁奖礼，她就去了，没想到会获奖。不过对刘方来说，《布罗岱克的报告》获奖是对她翻译成就的肯定，也有着更特殊的意义——它为刘方的翻译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今年82岁的刘方，因为眼睛疾患，已经很难再长期伏案从事翻译工作了。《布罗岱克的报告》是我翻译的最后一部作品。”这部作品能获奖，刘方“很高兴”，“我实现了我的愿望”。

“文学翻译工作不能小看”

“不要小看了文学翻译，文学对一个人心灵上的感染力，比一般的说教要深刻得多。比如当年很多人都是因为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等名著，才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好文学都是宣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哪怕作者自身是保守的，比如巴尔扎克，他自己是政治上的保守派，但是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一切，完全超出了他的世界观，揭露了社会的复杂性，这是他自己也无法控制的，文学的力量是很大的。”谈到翻译时，刘方仍然难掩自小对文学的热爱之情。她认为，文学给人的教育是“润物细无声”式的，“让人从心底里接受”。她们这一代人，从中外文学的优秀成果中得益良多，而谈起文学和文学翻译如今的处境，刘方的口中多了几分遗憾，她理解年轻人生存的压力，但说起现在人们很少读书，刘方仍然称“可惜”。

正是由于对文学的热爱和对翻译的兴趣，刘方并不特别看重重翻译的稿酬。她承认翻译的报酬是很低的，“你不知道翻译蒙田的作品一千字要花我们多少天的时间啊，如果光从钱的角度算

我们都不干了”。刘方笑着说：“不过这个倒无所谓，我翻译的时候也不会想着谁来重视我什么的，我按着我的兴趣翻译就是了。很多译者都没有太考虑这个问题，至少我们这些老翻译是没有考虑的。”相对报酬而言，刘方更在意工作的态度。她很怀念以前做翻译时，出版社的法语编辑会一句句核对原文，纠正译者难免的失误；对于一个句子的多种译法，译者和编辑会反复讨论商量，确定最合适的译法。

“说自己的话”

老一辈的法语译者中，刘方最欣赏傅雷的翻译，她觉得傅雷的翻译很好地兼顾了中文和法文的不同之美。评价译本，刘方看重“流畅”。在她看来，翻译是再创造，“信达雅”的标准中，“信”是基础，翻译者当然要以原文为基础，要真实准确地译出原文的内容和风格。但译文也应该是“自己的话”，要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法语明朗、准确、充满幽默感，而不同作家的风格和表达方式不尽相同。都德、雨果的感情充沛，福楼拜的冷峻，左拉自然主义的语言方式“有点啰嗦”，这些语感的差别都需要译者在译文中加以体现，这就是“达”。同时，语言是有节奏的，所以翻译时，译者需要反复推敲，必要时会在译文中加减字，以求读起来更舒服，这就是译文“雅”的层面。如果说“信”的

程度取决于译者的外语水平，“雅”则与译者的中文修养密切相关。做文学翻译，刘方觉得并没有速成的方法，“多读书，读中文作品，读法文作品，在阅读中加强自己的中文修养，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力求对语言的理解更深一些”。

作为从事了多年中译外的老翻译，刘方所说的“说自己的话”更有弦外之音。她说中国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非常多，但反观法国，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却很少。这其中确有译介方式的原因。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法文，当然最好由法国人来，但一方面法国很少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工作；另一方面，即使是熟练的法国翻译，对于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俗语、成语等也存在理解上的困难。刘方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合作翻译：“当年的《中国文学》杂志就聘请了外国专家为翻译把关，我们有了问题，随时可以向他们请教，这非常好。”说起《中国文学》杂志，刘方很自豪：“《中国文学》杂志翻译介绍了很多中国当代的中短篇小说，以及古诗和新诗。它面向海外发行，读者曾达到两万多。”《中国文学》杂志还出版过一套“熊猫丛书”，有英文版也有法文版。这套丛书着重译介了很多中国当代作家的长篇小说，如《绿化树》《人到中年》等，在法国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应该多多推介中国文学”，刘方强调，这可能是老翻译家对“说自己的话”更深层的表达。

译文

“你们曾经观察过蝴蝶吗，镇长先生，还有您，小学教师先生，对，蝴蝶，无论哪个种群的蝴蝶？没有？从没有？遗憾……太遗憾了！我可不一样，我把我的一生都贡献给了蝴蝶。有些人关心化学、医学、矿物学、哲学、历史，我呢，我整个的生活都奉献给了蝴蝶。它们完全值得我这样的奉献，但很少有人能明白这点。这很可悲，因为如果人们更关心一些这种华丽而脆弱的造物，就可以从中吸取对人类具有非凡作用的教训。你们想想，比如，在鳞翅目里有一种以‘火焰王’之名著称的昆虫，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它们有一种行为乍一看似乎毫无道理，但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那种行为完全合乎逻辑。谈到蝴蝶，可以说用极其聪明几个字来形容它们是很有道理的，‘火焰王’大约二十一群。当它们当中有一只找到了足够的食物供给全体食用时，你会想它们当中一定存在某种团结精神促使它们共同生活。它们往往能容忍自己的群体内存在其他种群的蝴蝶，然而，一旦有一只捕食类动物闯入它们

的群体，‘火焰王’之间似乎会互通报，用一种不知什么样的语言，于是，大家都躲藏起来。而那些普通的蝴蝶在片刻之前还与之同在一个群体内生活，但它们好像没有得到消息，于是，被鸟吃掉的就是它们。‘火焰王’把一个猎物送给捕食动物，就保全了大家生命。当它们群体内一切都很顺利时，一个或者几个外来户并不会让它们感到别扭，它们也许还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利用那些外来者呢，然而，一旦出现了危险，事关它们整个群体的生存时，它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与它们不同种群的蝴蝶。”

勃勒停止说话，然后重新开始一边踱方步，一边观察汗流浃背的奥施威尔和迪奥代姆。

“也许有些思想狭隘的人会认为那些蝴蝶的行为缺乏道德，但道德是什么，道德有什么作用？唯一的、占压倒优势的道德就是生命。只有死人永远是错误的。”

——刘方译菲利普·克洛代尔《布罗岱克的报告》

得失寸心知

□刘习良

1980年4月下旬。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的同窗老友陈光孚建议我和笋季英翻译《玉米人》。那时候，我对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创作了解甚少。只知道他的《总统先生》被称作“政治小说”，《玉米人》被称作“社会小说”。6月上旬，我拿到原著，读了开头几页（描写加斯巴尔·伊龙似梦非梦、亦梦亦觉那一场），竟然不知所云。硬着头皮读下去，书中出现了一些故事情节，能够读懂了。试译了两三页，实感力不胜任。犹豫了4个月之久，到10月上旬方才勉强答应下来。不料，这颗“苦果”我们竟啃了十个春秋。

1979年，我被任命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拉美部副主任；1982年，又被任命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台长。笋季英在中共中央联络部工作，经常陪同来华访问的拉美外宾到国内四处访问。对我们来说，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纯属业余爱好。因此，可以利用的时间只有清晨、夜晚以及节假日。屈指算来，至少花费了两三年的时间才完成翻译。

翻译《玉米人》之前，我们已经合作翻译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枯枝败叶》《恶时辰》以及几篇短篇小说，从来没有感到如此费劲。我们一起研究过这是为什么，结论是：翻译《玉米人》我们有四方面的不足。

首先是不熟悉作品中描写的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的生活细节，特别是他们的思维方式。书中大量出现的饮食服饰、宗教典礼、民风民俗都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带有强烈的地方特色，表达这类事物的名词都成为大大小小的“拦路虎”。其次是不大了解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技巧。那些神奇怪异、亦真亦幻的场面和半醒半睡的状态，既难理解，更难表达。第三是对阿斯图里亚斯

的创作道路，尤其是《玉米人》的创作意图，缺乏基本知识，难以自觉地把握和传递作品的气韵和特色。最后是我们的汉语修养远远不足以传递这位具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丰富多彩的语言。作者对山林大火的威势、夜行山路的恐怖、野宴的热闹、市廛的繁华等场景做了细腻入微的描绘，使用了大量方言土语，创造了许多新奇的比喻，加上巫师的咒语、疯子的胡话、江湖医生的信口开河、黏嘴儿人的口齿不清，都要求译者掌握广泛的语言知识。

“病因”找到了，剩下的就是“对症下药”了。一般地了解拉美印第安人的历史和现状，并非难事。只要查阅书架上存放的有关研究印第安人的中外文书籍、杂志就可以了。另外，我曾经做过七八年的口译工作，和外宾闲聊时，听到不少关于印第安人的故事。但是，直接调查以便掌握一手材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所幸的是1985年笔者有机会陪同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访问墨西哥。在参观人类学博物馆时，看到一幅巨大的壁画。占壁画中央的是一棵茁壮的玉米秆，根部牢牢地扎在地下，下面横卧着一个印第安人。这幅画形象地告诉人们印第安人对“玉米”和“人”的关系的认知。他们认为“玉米”和“人”之间存在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人靠食用玉米维持生存，死后化作

养育玉米的肥料。如此循环往复，维持着印第安人的繁衍。代表团还游览了著名的印第安人遗址——奇琴伊察。导游领着我们参观了建筑完美的金字塔、精美的石雕和各种器物。还详细介绍了印第安人对天神羽蛇的虔诚崇拜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的生死观。这些间接的调查总算帮助我们迈过了一道门槛，对印第安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

我们不是外国文学的研究者，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钻研国外流行的各种文学流派。只是为了翻译《玉米人》，才阅读了少量介绍超现实主义的文章，获得一些粗浅的认识。从中得到的好处不过是不再为阿斯图里亚斯的创作手法（不同于我们比较熟悉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感到惊奇而已。魔幻现实主义是拉美文学主要流派，也是我国拉美文学研究人员的热门话题，报刊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阅读这些论文，加上青少年时期阅读过《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等古典小说，觉得魔幻现实主义还是不难理解的。结合翻译《玉米人》的体会，我也在翻译后大胆提出了对魔幻现实主义主内虚的表述。

1983年6月，我们翻译了两篇国外文学评论家撰写的论述阿斯图里亚斯作品的论文。一篇是危地马拉学者劳尔·利瓦的《阿斯图里亚斯的几部主要小说》；另一篇是墨西哥学者阿赖德·弗帕的《阿斯图里亚斯作品中的现实和非现实》。翻译这两篇论文令我们受益匪浅。主要收获是对阿斯图里亚斯的生平、创作道路、创作意图、语言风格以及美学追求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做好“外围”努力的同时，我们一刻没有放松翻译《玉米人》这一“核心业务”。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专门研究过翻译理论，特别是文学翻译理论。翻译西语文学作品，只能靠“笨功夫”。第一步是“粗译”，就是以比较快的速度尽量准确地完成初稿。第二步是“细加工”，就是对初稿动“大手术”，这个步骤花费的时间最多。在“把文学翻译视为翻译文学”的理念指导下，尽量用纯正自然的汉语修改初稿中屡屡出现的西化句子。第三步是“再加工”，对抄清后的二稿加工润色，重点在于求得译文通篇风格的统一。第四步是诵读，自己读，有时也请“第一读者”读。在诵读的基础上对三稿做适当修改。最后一步是阅读清样，只改动那些非改不可的地方。对这套做法，我们曾戏称为“死中求活”，或者说得更好听一点，是“以勤补拙”吧。就这样，1985年8月终于五易其稿，交出了全书译文和前言、附录。

翻译需不需要查字典？这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事情。但是，的确有人说：“你搞翻译，全靠字典。”虽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本科学习了4年，又在高级翻译班进修了两年半，我还得承认，能够比较熟练运用的词汇仍然有限，不靠字典还真不行。但是，“全靠字典”也不能解决所有难题。阿斯图里亚斯在《玉米人》中使用了大量的危地马拉特有的方言、俚语。按照字典的释义，有些词在原著的上下文中根本不通，或者干脆没有收入。然而幸运再次眷顾我们。1984年，笋季英接待了一位危地马拉来访者，借着访问的空闲时间向他提出了二三百个语言问题。对方热情地一一作答，有些问题甚至引得他哈哈大笑。据来实说，除了像他那样土生土长的危地马拉人之外，其他拉美国家的人恐怕也弄不懂那些方言俚语。

我自1953年秋季进入外语学院至今已过去了将近60年。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没有离开翻译工作，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时，在从事中译外的工作。中年以后，才开始译丛中工作。我对翻译的理解，简单地说，是把用一种语言形式表达的思想内容准确无误地——理想的目标是“完美无缺地”——用



刘习良

刘习良，195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曾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台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译有《玉米人》《恶时辰》。

译文

塞昆迪诺·穆苏斯少尉头发蓬乱，脸色发青，好像绿色的西红柿。身上热气腾腾，散发着一股汗臭。他头戴一顶炭火盆似的草帽。身穿身穿军大衣，外面披了一件雨面口袋做的外套，口袋上的商标缝在腋下，已经磨得模糊不清了。下面是皮护腿，马刺松垮垮地挂在马鞍上。脚后跟上长满鱼鳞。他紧催胯下的小马，沿着崎岖的山路，不前不后地尾随着骑警队长查洛·戈多伊上校，不时地斜视一眼，窥测上校的脸色。查洛·戈多伊上校火气挺大。上帝保佑，千万别惹着他。

是啊，巡逻队落在后面，谁知道哪年哪月到哪一站才能赶上来。为了这事，队长十分恼火，憋了一肚子气。

少尉是个爱说爱笑的人，可一连几个小时一声也不敢吭。两个人沿着一条怪石嶙峋、僻静荒凉的山路朝山顶攀登。马匹累得呼呼喘气，愈来愈没劲。漆黑的夜色中，骑手啥也没看见，心情十分烦躁。有几回，少尉策马赶上队长，斜瞟他一眼。一看队长的脸拉得长长的，赶快勒住马，退了下来。

走着走着，少尉的马一溜小跑，和队长走了个并排。得，等着挨批吧。戈多伊上校发觉有人追上来，扭过头去，两只螃蟹眼直冒火星，当即破口大骂。少尉使劲勒住坐骑，屁股一扭，用脚尖紧紧踩住马镫。

“嘘……勒着点儿！听见响动，我寻思是巡逻队赶上来了。敢情是你！你也不让马喘口气儿？这帮家伙，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怎么还没上来？八成一路上光顾着吃吃喝喝、游山逛水了。走了几步就下马，什么肚带松啦，听见怪声啦，把耳朵贴在地上找我们啦。压根儿没打算放开马紧跑几步。我算计着，他们当中有人会说：‘快点吧！头儿在前面哪！’那还得赶上他们没到村里偷鸡摸狗去。等一进村，老娘儿们啊，老母鸡啊，全得倒霉。这帮小子啥也不顾，先想取乐。什么好吃、哪个娘儿们标致，碰上他们全得遭殃。等玩够了，又该说啦：‘快滚吧，冒失鬼、懒虫、浑蛋。’准是这么回事。这回他们可上当了。我故意安排下人，看着他们抢了啥东西，谁是领头的。哼，这帮畜生！我这儿跑得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们可像乌龟一样地爬。哟，这是什

么？红得跟血一样，真漂亮。是什么？我的妈呀。什么玩意儿？”

少尉没有答腔。心里想，上校像山羊撞头似的呜哩哇啦喊叫一顿，大概以为他全听明白了。他把尖尖的喉结上下动了动，一不是喘气，二不是累得咽唾沫，而是心里有点害怕。他骑的那匹马呼呼地喘气，挺着脖子，马鬃好似一把钢锯。

夜色昏暗，山峦仿佛不停地上升。骑手的眼睛好像蒙上一层阴翳，怪不舒服的。潮湿的夜露从喧闹的天空上垂挂下来。夜空下，山峰耸立，宛如一把木梳。马蹄叩打在山沟的青石上发出喀嗒的铜音，好像敲打着白铁器皿的铿锵声。在干枯的枝杈和蛛网间，在坚硬的黏胶和被蚂蚁蛀空的枯树间，在被云雾般的飞虫包围的木棉树间，似橡胶一样柔软的萤火虫灵巧地上飞飞舞。灰羽毛的小鸟张开小嘴，露出蓝齿般的碎牙，咕咕地叫个不停……天蓝羽毛的小鸟儿蜷曲在翅膀下面酣睡着。还有些小鸟唧唧喳喳，给沉寂的山谷增添几分生气。

——刘习良、笋季英译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玉米人》

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在内容上，译文对原文具有绝对的依附性，这就决定了翻译本质上是一项被动性工作。在形式上，译者则应充分发挥译入语的优势，恰如其分地运用创造力，尽量完好地传递原文的风貌。因此，翻译的过程也就是译者凭借主观条件（主要是知识修养和语言功底）不断摆脱被动性、发挥主动性的过程。

以切身感受而言，我一直觉得翻译是个“苦差事”，“苦”就苦在译者非常被动。郭沫若先生是翻译大家，他在《谈文学翻译工作》中指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因为“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翻译又是一件“乐事”。严复先生对翻译的“苦”“乐”有过绝妙的表述。遇到难解之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经过反复推敲，多方查询，前后对照，突然“心悟神解，振笔而书”，喜悦之情油然而生，可谓其乐无穷！这些都是翻译先辈们的至理名言，我们一直铭记在心。

我们的志愿就是力争永远做一名合格的翻译。